



老舍与语文教育

Laoshe Yu Yuwen Jiaoyu

张炜炜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老舍与语文教育

Laoshe Yu Yuwen Jiaoyu

张炜炜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舍与语文教育/张炜炜著.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 - 7 - 209 - 08659 - 2

I. ①老… II. ①张… III. ①老舍(1899~1966)—文学研究 ②汉语—语文教学—研究 IV. ①I206.7 ②H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75972 号

责任编辑:王 晶



老舍与语文教育
张炜炜 著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莱芜市华立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规 格 16 开(169mm×239mm)

印 张 12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

ISBN 978 - 7 - 209 - 08659 - 2

定 价 2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电话:(0634)6216033

contents

目 录

绪 论	1
-----------	---

第一章 “语文教师”经历对老舍文学创作的影响

.....	3
-------	---

第一节 国文教师与作品语言	4
---------------------	---

第二节 教师生涯与创作素材	7
---------------------	---

第二节 “立身饭碗”与“立命”理想	8
-------------------------	---

第二章 老舍的语文教育观

11

第一节 文艺与教育的“合一”	11
----------------------	----

第二节 “实利主义”的语文教育观	15
------------------------	----

第三节 探索现代语文教学方式	18
----------------------	----

第三章 中小学语文教育视野中的老舍作品

21

第一节 “国文”教材中的老舍作品及老舍形象

(新中国成立前)	21
----------------	----

第二节 老舍在语文教材中的身份“定位”

(1949年~1977年)	29
---------------------	----

第三节 “老舍”在新时期语文教育中的意义

(1978年至今)	38
-----------------	----

第四章 三四十年代大众语文运动背景下的老舍创作

.....	50
-------	----

第一节 老舍的文学语言与文艺大众化	51
-------------------------	----

第二节 通俗文艺与雅俗共赏	58
第五章 老舍作品的语言特色与语言教学的典范性	65
第一节 从“日常生活语言”到“文学语言”	66
第二节 “语言美”与教学的典范性	74
第六章 个案分析之一：“骆驼祥子”“在烈日和暴雨下”的人生意义“遮蔽”	83
第一节 “版本”的嬗变与内容的删改	83
第二节 “祥子”“在烈日和暴雨下”的人生意义	92
第七章 个案分析之二：《小麻雀》——在语文教学中逐渐“长大”	111
第一节 “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	111
第二节 争议：“小麻雀”究竟象征了什么	115
第三节 “麻雀之难”：赤子之心展现	117
第八章 个案分析之三：《济南的冬天》——残缺的“完美”篇章	123
第一节 从《一些印象》到《济南的冬天》	124
第二节 由内容“残缺”引发文学“误读”	126
第三节 文本“意延”与教学阐释	131
第九章 个案分析之四：《龙须沟》《茶馆》——话剧教学的经典文本	138
第一节 《龙须沟》：从“颂歌”到教学重点的转换	138
第二节 《茶馆》：“大舞台、小社会”的教育意义	144
第三节 从语文课中延伸出的历史记忆	148
第十章 老舍作品的语文接受与教学经典化形成	151
第一节 老舍作品在语文教学中的“效果”实现	152

第二节 从“视界变化”来探索老舍作品的教学方式	157
第三节 老舍作品的文学经典化形成	164
余论：在文学经典与语文教学经典之间	168
第一节 “经典”的变动与永恒	168
第二节 “接受”不同、“经典”差异	171
第三节 选文标准与经典命运	173
参考文献	175
跋	魏建 185

绪 论

老舍,一提到这个名字,我们首先想到的他是一位著名作家,想起他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想到他是“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①,是传统文化的批判者、热爱者和建构者。在这些称谓和描述之前,我们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老舍首先是一位教师、是一位语文教师。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老舍在步入他的语文教师职业道路的同时孕育和成就了他的创作业绩。我们无法设想不从事语文教育的老舍是否还会成为著名作家老舍,而且,老舍一生有将近 20 年时间从事语文教育工作,他的语文教育实践与他的文学成就之间必定有着密切的联系。

老舍不但是是一位著名作家,而且是与语文教育关系非常密切的教育家,评论界对作为作家老舍的研究是充分的,而对他与语文教育关系的重视是缺乏力度和深度的。如果我们从“语文教育”的角度对老舍的思想、创作进行新的探究的话,这对认识老舍的个性存在、文艺思想无疑是具有开拓意义的。总结老舍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语文教育思想,探讨老舍的文学作品作为语文教学经典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版本”嬗变与“意义”还原,将对老舍研究领域的开拓具有筚路蓝缕之功,并对当下的语文教育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同时在思想梳理和资料收集过程中期望能对老舍研究具有史料学意义上的贡献。

老舍的语文教育思想、作文教学实践,作品在语文教学过程中的经典化生成,老舍作品的语言风格,以及他在文学活动中锤炼语言、提高语言的理论与实践,这些都体现着作家老舍作为语文教师本色的方方面面,值得我们去研究。但在老舍研究界,对“老舍与语文教育”这一论题的研究还相对薄弱。目前的研究现状是:首先,语文教育界对老舍作为“语文教育家”的认识不够充分,对其关于语言学习、文章写作方面的真知灼见缺乏足够的重视。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1966 年之间老舍在公开场合的演讲、报告、谈话以及写作的文艺理论著述与创

^① 赵园:《老舍——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载《文学评论》1982 年第 2 期。

作经验的文章的数量来看,老舍可称得上现代语文教育的理论家与活动家,所以语文教育家吴伯威认为,像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作家的“作品以及他们有关文艺创作的论述”“为语文教学作出了贡献”^①,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翻开“老舍文集”“老舍全集”和任何一本的“老舍年谱”,我们都会发现,老舍从《文学概论讲义》开始的文艺理论著述,从《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开始的创作理论以及谈及语言运用哲学与技巧的文章,不但数量相当可观,并且从时间长度来看,与其文学创作自始至终是同步的,这种状况从现代、当代文学作家来看都是绝无此例的。这一过程“全景”地展示了一位作家技艺娴熟、风格成熟的过程,这对于写作爱好者、模仿者无疑具有文章“写作学”的指导意义;然而,老舍在这一时期关于“语文教育”的主张并没有引起语文教育界应有的注意。学者们早已注意到老舍的文学创作与语文教育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但也只是简单地介绍,并没做深入考究式的研究;老舍研究界和语言研究界早就注意到老舍的文学语言风格、北京方言特色,以及对文学语言规范化的贡献,但稍遗憾的是没有从整体上对老舍“白话文”的个性特色、文学个性、文学成就与中小学语文教育之间的关系作出系统的界定。

因此,选取“老舍与语文教育”这样一个论题,也在于通过阐释“文学经典化与语文教育机制”之间的紧密联系,试从资料考释、作品接受、文本阐释、教育运行机制等视角来认识中国现当代作家及其文学作品进入语文教育视野的各种深层动因,并探讨现代文学作品在语文经典化过程中所显现出的时代价值、文化取向及与不同时代语文教育机制之间摩擦、契合、取舍等关系,以及文学作品自身美学价值、文化价值等的彰显与不同时代之间的制约关系。因为在整个学校语文教育实施的过程中,教科书无疑是课程的中心环节和学校教育的重要载体;而教科书正是通过提供(被选择的)“经典”和阐释经典慢慢影响了人们关于“文学”的观念和版图,但是究竟哪些文化资本成为被选择的对象、哪些文化资本被排除到知识和文化的势力范围之外,这也成为我们探究文学、语文教科书和权力之间关系的重要角度。同时,本论题一方面对于当下的语文教学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语文教学(比如对老舍作品《在烈日和暴雨下》在语文教学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究,另一方面对于语文教育领域的教材编撰、作家作品选录、练习设计等环节的设置也作了尝试性探索,在这里一并就教于学者和专家。

^① 吴伯威:《谈五四运动到解放前的语文教学》,载《中学语文教学》1979年第2期。

第一章 “语文教师”^①经历对老舍文学创作的影响^②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那就是很多大作家都曾做过语文教师,比如鲁迅、老舍、曹禺、朱自清、闻一多、艾青、臧克家等人都曾做过中学语文教师;老舍和叶圣陶等还曾做过小学语文教师并教过中学语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例如鲁迅、老舍、朱自清、闻一多等后来还在大学的中文系任教。如果我们对作家的文学创作与其所从事的语文教育的渊源关系进行探究的话,他们的语文教学和文学创作之间势必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不但促进了现代文学创作的发展和进一步规范化,同时也推动、滋养着现代语文教育的成长和成熟。老舍正是具有这一意义的现代作家之一,笔者将以此为个案,对老舍的“语文教师”经历对其文学作品成为语文教学经典及其文学创作的影响进行尝试性的探寻。

① “语文”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始于1950年6月。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出版了全国统一的“语文”课本:《初中语文》《高中语文》。全国中小学一律使用国定的统编本,不再使用自编本,“国文”、“国语”的学科名称被取消,新建的学科定名为“语文”,自此开始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语文”教育的新时代。对于“语文”这一学科的新名称,统编本《编辑大意》解释道:“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叶圣陶在60年代解释说:“什么叫语文?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叶圣陶:《认真学习语文》,1963年10月5日《文汇报》)后来张志公进一步解释到:“这个‘语文’就是‘语言’的意思,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在口头谓之语,在书面谓之文,合起来就是‘语文’。”(张志公:《说“语文”》,载《语文学学习》1979年第1期)也就说,“‘语文’这个词狭义的专指‘语言和文字’,也可以广义的指‘语言文字和文学’”(载《语文学学习》1951年11月号第2期)。“语文教师”中的“语文”一词是取其“广义”的概念内涵和外延。笔者在本文中对“语文”“国语”“国文”三个词语的使用尽量还原其使用的历史语境。

② 本章节以《老舍的“语文教师”经历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为题发表于《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第一节 国文教师与作品语言

老舍的文学作品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就受到语文教育界青睐。其作品被选入“国语”“国文”教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老舍作品的“说话”“口语化”特色,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在选用老舍作品进入语文教材时曾称赞说:“老舍先生文章的风格第一,从尽量利用口头语言这一点上显示出来”^①,是“大众口语化的白话文”^②经典。据老舍自己说,《小坡的生日》“很得文人——如冰心等——夸美”,并且“北平与济南的国语运动机关久想印它,为宣传纯正国语的教本”^③。语文教育界对老舍作品中文学语言的认可直接推动了老舍作品进入新中国成立前中小学“国文”教育的进程,这从语文教育家选录老舍作品并以语言作为介绍的重点就可以看出。由此可见,老舍作品在文学语言(白话)上的成熟与其做国文教员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从老舍的人生阅历来看,老舍的一生都直接或间接地从事教育工作,他做过小学、中学国文(语文)教员和大学文学教授。从他对白话语言的锤炼、不遗余力地对祖国语言文字特质美的推广等经历和言行来看,老舍无不是中国现代语文革新者和建构者,有的语文教育家早就指出,“如果我们说老舍是一位教育家,尤其是语文教育家,那是名副其实的”^④。再者,从语文教师到作家的职业转变,这中间不是没有联系的突变,它们都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工作,所以说老舍前期的语文教育实践对他后期的文学创作活动,必然会有重要影响。但两种工作之间也存在着差别,有的学者指出,“这两种工作毕竟在思维方式、操作方式上有着较大的差异”。但老舍的语文教育实践对其文学创作活动的影响也是客观存在和显而易见的,它“可能更多地表现为现代民族语文精神,诸如文章结构布局的讲究,白话文的优长与创新,现代汉语的发展与规范,以及诵读、札记、

① 叶圣陶:《文章例话》,《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上册),北京教育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45—246 页。

② 余冠英:《坊间中学国文教科书中白话文教材之批评——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教材教法研究讲稿》,载《国文月刊》1942 年第 17 期。

③ 老舍:《致赵家璧信》,引自张桂兴:《老舍年谱》(上),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93 页。

④ 江锡铨:《老舍的文学成就与语文教育实践》,载《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18 卷第 5 期。

斟酌字句等语文习得方法的沿用等等这样一些语文精神的潜移默化的浸润,更多地表现为潜在的,隐性的,不十分自觉的影响”^①。对于老舍“语文教师”的身份和作用,许多研究者是不太重视的。学者们对此忽视的依据是老舍在其创作谈、回忆散文中多次提到自己对于“语文教师职业”的无奈,甚至否认后来的写作与“国文”教员之间的内在关联。比如老舍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中谈到自己的写作时是这样说的:

除了在学校里练习作文作诗,直到我发表《老张的哲学》以前,我没写过什么预备去发表的东西,也没有那份儿愿望。不错,我在南开中学教书的时候曾在校刊上发表过一篇小说;可是那不过是为充个数儿,连‘国文教员当然会写一气’的骄傲也没有。我一向爱文学,要不然也当不上国文教员;但凭良心说,我教国文只为吃饭;教国文不过是且战且走,骑马找马;我的志愿是在作事——那时候我颇有自信有些作事的能力,有机会也许能作国务总理什么的。^②

通过老舍的这段“自白”,我们看到老舍在表明其文学成绩与其职业——教员之间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我们也确实看到老舍在中学教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写作练习,而且这种练习在老舍写作生涯中的地位颇为重要。要不然我们不能解释为什么老舍初登文坛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一下子就具有了成熟的艺术技巧,这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其背后肯定有个长期的写作“准备期”。所以,忽略老舍这段“国文教员”生涯就等于截断老舍创作的“准备期”与其整个文学创作之间的联系,这显然是不明智的。我们认为,“教国文”对老舍来讲并不“只为吃饭”,它还老舍提供了日后进行文学创作的基奠、素养和空间。

1918年老舍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接着被京师学务局任命为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兼国民学校校长,1920年9月又被任命为郊外北区劝学员,之后又应聘到一些高等小学或国民学校主持教务。而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据老舍自己说深受影响。老舍曾在《“五四”给了我什么》一文中表示:“‘五四’给了我一个新的心灵,也给了我一个新的文学语言。”^③“五四”运动带来的思想的改变、语言的更新震动了老舍,新的契机促使老舍放弃散文学“桐城派”、诗

① 江锡铨:《老舍的文学成就与语文教育实践》,载《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8卷第5期。

② 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4页。

③ 老舍:《“五四”给了我什么》,《老舍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6页。

学“陆放翁吴梅村”的传统文章之学,开始转向新诗创作和白话小说的练习。在这期间,老舍担当的“校长”“劝学员”之职不但对本校的教育工作发挥了指导、改革的作用,而且对所管辖的学校的新式教育、白话教材的推行和实施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为中国现代教育特别是语文教育的革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时期老舍既从事行政又兼语文教师之职,多从事“国音、国语文法、国语教授法”的补习,还经常到贫儿学校和地方中学做义务教员。^①在1921年4月1日《海外新声》第1卷第2号上,老舍发表了白话新诗《海外新声》3首,接着小说《她的失败》第3号发表。对于这个时期老舍的文学创作活动特别是对“白话”语言运用的迫切性,舒乙先生称之为“拼命学写白话文”的阶段,并对老舍这个时期的小说《她的失败》的标志性意义做了这样的评定:

这是一篇相当不错的小小说,寓意较深,比较含蓄,白话文写得相当流利了,标点符号使得挺熟练,证明“拼命地练白话文”已有相当的成就。但通体看来,它只是一篇过渡性的习作,有的地方用词像清末的白话小说,譬如“时时掩了书”;有的地方像带点洋味的早期的白话新文体,并不太口语化,譬如“她却懒着向院中看”,有的字词过于抽象,不通俗,譬如“啁啾啾”“甚且”“去激动别人”。

……像“始祖鸟”那么珍贵,因为它们是通向纯粹白话文的小桥。^②

接着,在1922年9月,老舍辞去劝学员的工作应聘到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教授初中国文。在这段担当国文教员期间,老舍不但参加了出版、演讲活动,而且继续进行白话小说创作,被老舍称为“为充个数儿,连‘国文教员当然会写一气’的骄傲也没有”的《小铃儿》就发表在天津南开学校的校刊《南开季刊》上。虽然老舍本人只承认这篇小说所具有的只是一点“用白话写的”“历史价值”^③,但我们明白,正是这些弥足珍贵的、具有像“始祖鸟”价值的文学习作,才奠定了老舍“纯粹白话文”创作的成功之路。

当然,如果有人认为,老舍的“语文教师”时期不能成为其日后进行白话文创作、且在语言上取得高深造诣的必然条件,这种理解尽管有其合理性,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五四”白话文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在于1920年1月教

① 张桂兴:《老舍年谱(修订本)》(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5页。

② 舒乙:《我的思念——关于老舍先生》,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107页。

③ 老舍:《我的创作经验》,载《刁斗》1934年第1卷第4期。

育部下令各省“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①,这一举措促使白话文学作品大量进入中小学语文教学,而老舍在这一时期所担任的行政职务和国文教师的身份使其能够迅速地接触到这种“革新”成果,身体力行地在自己所辖的区域内推行白话教材;并且感受到白话语言的感召,“拼命学写白话文”。以此来看,这虽不是必然因素,但却是老舍从事白话文学创作的必要条件。

第二节 教师生涯与创作素材

老舍在任语文教师期间所取得的社会经验非常重要,它或者直接成为老舍写作的素材,或者为老舍提供了认识生活、认识世界的机遇,又或者影响了老舍的思想状况以至改变了其创作的思路。老舍曾说过,“在我的初期的作品里所表现的是兴之所至,写出我自己的一点点社会经验。兴之所至的‘兴’从何而来呢?是来自‘五四’运动。……到了‘五四’运动时期,白话文兴起,我不由得狂喜。……我开始偷偷的写小说……用白话写,而且字句中间要放上新的标点符号,那是多么痛快有趣的事情啊!”^②这段话表明了老舍的“语文教师”时期不但为老舍的创作提供了“语言”上的支持,而且这段时期的社会经验成为老舍文学创作的重要材料来源。老舍的成名之作《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的主要内容就取材于老舍这六七年时间的“教育”生涯,以“老张”为代表揭发教育界“鱼目混珠”、见利忘义等的一些腐败现象都是老舍“亲眼看见的”,“其中的事多半”是老舍“亲身参加过的”^③,所以老舍才说他最初的作品是他“利用在教育作事六年的经验凑成”^④的。

至于老舍远赴英伦被任命为中文讲师,并讲授中国古文、北京话等课程的这段时期也甚为重要。值此机遇,老舍得以慢慢积累材料、进行中英两国国民性的比较,《二马》才有机会诞生。还有,老舍在担任语文教员的过程中,从所教授学生的活跃思想中得到感悟,进而影响到其文学创作观念的改变。据老舍在

① 《命令》,载《教育杂志》1920年第12卷第2期。

② 老舍:《〈老舍选集〉自序》,载《人民日报》1950年8月20日。

③ 老舍:《我怎样写〈赵子曰〉》,《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0页。

④ 老舍:《习作二十年》,载《抗战文艺(重庆)》1944年第9卷第3、4期。

《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中说，原本打算而且已经写了四万多字的小说“大概如此”，可是“到了新加坡，我决定抛弃了它”，原因在于，“在新加坡，我是在一个学校里教几点钟国文。我教的学生差不多都是十五六岁的小人儿们。他们所说的，和他们在作文时所写的，使我惊异”；“我一遇见他们，就没法不中止‘大概如此’了。一到新加坡，我的思想猛的前进了好几丈，不能再写爱情小说了”^①。应该说，语文一科是教师和学生进行思想交流最激烈的课程，也是学生思想最活跃的课程，老舍受这一段经历的影响，放弃了“爱情小说”的写作无疑是理智的，因为从其所擅长的写作题材来看，老舍更娴熟于市民社会、市民人生的描摹。

第三节 “立身饭碗”与“立命”理想

从经济层面来看，“教书匠”的生活为老舍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免除了他因经济窘迫而影响到所写作作品的质量。老舍所说的“教国文只为吃饭”，“教国文不过是且战且走，骑马找马”，在这个层面是十分中肯的。因为在当时社会的出版制度和稿酬制度不完善、不发达的情况下，当一名“职业作家”是有风险的。鲁迅先生就曾在日记里仔仔细细地记着他的几乎每一笔收入支出，他的收入主要来自三个方面：薪水、讲课费、稿费。他很看重重固定的薪水，因为讲课费、特别是稿费是不稳定的。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鲁迅先生说：“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②和鲁迅先生一样，老舍也没有讳言“钱”的重要性，他坦言到：“报酬少，少写不如多写”，所以作品就有“少而好不如多而坏的大批发卖”的无奈，“自己觉得很对不起文艺”，可是“钱”“是不可得罪的”^③。所以，即使

① 老舍：《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183页。

②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0—161页。

③ 老舍：《我怎样写短篇小说》，《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5页。

老舍“老早就想放弃教书匠的生活”，有想“硬试试职业写家的生活”^①的打算，但“为了一家子的生活”，老舍也“不敢独断专行的丢掉了月间可靠的收入”^②。尽管老舍曾辞去过青岛山东大学的教职，在青岛专职做作家，写下了他最具有代表性的小说《骆驼祥子》，不过，这也是以他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后盾的。而且这职业写家的路颇为艰辛，老舍在辞职近一年后写道：“除了星期日或有点病的时候，我天天总写一点，有时少至几百字，有时多过三千；平均的算，每天可得两千来字”；可是“连版税带稿费，一共还不抵教书的收入的一半，而青岛的生活程度又那么高”。所以老舍感叹道，“但分能干别的去，不要往这里走，此路不通”^③。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老舍做了近一年的“职业作家”之后，重新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而我们从老舍这一年的创作来看，像《骆驼祥子》这样的抗鼎之作也有，但更多的却是在经济压力下所做的“短篇小章”，大有“多而坏的大批发卖”的窘困。所以我们可以说，老舍所从事的“教书匠”的生活为老舍的前期创作提供了从容思考、潜心写作的经济基础，为老舍文学创作的成熟提供了相对丰裕的经济空间。

关于老舍在“教书匠”和“职业作家”之间犹豫无奈的心境，以及在两种职业之间的利弊得失情况我们需要辩证分析。因为我们从老舍的人生经历和写作经历来看，老舍在写作《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之前在国内办教育、从事语文教学时期，“写作”是被当做从事教育、教学的“副业”来进行的；及至三篇作品小说问世使老舍成名于国内之后，老舍的兴趣中心转移，“教师”是他“且战且走，骑马找马”的“立身饭碗”，而“职业作家”成为他“立命”的理想。在《钢笔与粉笔》这篇短文中，老舍说：“钢笔头下什么都有。要哭它便有泪，要乐它就会笑”，但是“它——不——能——生——钱”；而“粉笔比它强，我喂它，它也喂我”，所以老舍也有让钢笔生锈，“拿粉笔写黑板去者”的冲动。^④ 尽管在职业的选择上，老舍心存矛盾，但我们也不可忽视“作为语文教师的老舍”在语言更新、资料积累、思想锤炼及经济基础等方面给予“写家老舍”的诸多支持，而以此为

基础才成就了老舍一代文学大师的伟大业绩。

综合来看，从事“语文教师”的经历不但为老舍从事文学创作带来了契机，

① 老舍：《我怎样写〈牛天赐传〉》，《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2页。

② 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4页。

③ 老舍：《这几个月的生活》，载《益世报》（天津）副刊“文艺周”1937年4月25日第49期。

④ 老舍：《钢笔与粉笔》，载《益世报》（天津）1935年12月15日。

而且在奠定语言基础,在资料积累、思想锤炼及经济支持等方面准备了条件;并且,在作品传播方面,老舍获得了新式语文教育界的青睐,其作品以教学篇目的形式教授并逐渐升华为语文教学经典。因此,我们可以说,“语文教师”和文学“写家”对老舍来说是不可分离的两个分身,就如手心手背、一叶两面,没有了语文教师的经历,也就不存在写家老舍的文学成就。

第二章 老舍的语文教育观

众所周知,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大师里面的多面手,国文教师、大学教授、作家、“人民艺术家”和“语言大师”等这些称呼不能单独使用而要叠用相加才能全面概括老舍一生的贡献。老舍,从做国文教员时期的“白话文教学”到他“典范的白话文”创作和同期发表的关于谈论文学创作经验、语言运用技巧、语言锤炼的具有相当数量的文章,以及他对中学语文教学的意见和建议来看,老舍的一生就是语文教育实践的一生。这不仅包括老舍作为国文教师、大学教授的教员生涯,同时也包括他作为著名作家、“人民艺术家”和语言学家的身份认同在社会上所起的教育实践作用。由此,笔者将从老舍的语文教育实践中探求文艺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并探索现代语文教学方式的创新,以此来考查老舍的语文教育观。

第一节 文艺与教育的“合一”

老舍的语文教育实践肇始于1918年7月,由师范学校毕业的老舍被任命为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兼国民学校校长。^①在这期间,老舍与京师地区的几位优秀小学校长受京师学务局的派遣,奔赴南京、上海、吴县、无锡和南通等地参观了28所学校,并从学校编制、课程设置、教学研究和教学设备等方面作了细致的考察,并形成了书面考察报告。^②此后,老舍相继被任命为劝学员^③

① 据1918年9月15日第5卷第9号《京师教育报(公牒)》载,京师学务局发布21号“委任令”：“兹派舒庆春为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兼国民学校校长,此令。”

② 《荣英、刘耀曾、王峰、舒庆春等参观苏省小学教育报告》,原载1920年1月至3月《京师学务局教育行政月刊》第1卷第3、4、5号。转引自张桂兴编著《〈老舍全集〉补正(下编)》中的《参观苏省小学教育报告》,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年版,第385页,第402页。

③ 《命令》,载《京师学务局教育行政月刊》1920年9月30日第1卷第12号。